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6NIAN
● SANWEN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散文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祝勇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散文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祝勇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祝勇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6年散文/祝勇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3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70-4

I. 2… II. 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8498号

2006年散文

责任编辑 李殿华 施凌飞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316千字

印张 11.625 插页 2

印数 1—9000册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4222803

序

祝 勇

2006年，我在美国盘桓数月，在一所大学里，专心写自己的书。那几个月里，中国逐渐变成了报纸上的各种小道消息，中国散文，也面目模糊起来。在美国，没有人关心中国散文的事，大学里，没有学者研究中国散文，书店里很少有中国散文译本，甚至找不到“散文”这一分类。即使对于专家，当我说出一个中国散文家的名字，他们都会一脸茫然。

即使在中国，散文也略近于不存在。除了在一些时尚类报刊上充当消遣的角色，作为文学种类的散文几近失业。发表它们的报刊少之又少，与这火红的年代相比，它显得无足轻重，或者说，它根本就不重要。用韩少功《回到从前》中的话说：“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人们眼里的中国文化正在变成以帝王剧、偶像剧、婆婆妈妈剧为代表的一堆泡沫，全心全意为成功人士服务的文化艺术正在蓬勃发展，华丽、单调、疲倦、虚无。

连我自己也变得懒惰，交稿在即，我迟迟不肯动手。我变得日益脆弱，很难承受失望。如同写作一样，我对本书的编辑工作几乎是在无奈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它，如同

写作，已扎根在我生命中。这至少使我（们）的生命保有了最低限度的警醒，为此，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于是，在遥远的另一岸，我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散文。我的视线开始穿越那些巨大的物体，比如海洋，或者大地，落实在每一张具体的脸上。我看清了他们的表情，它们关系着另一个中国，一个附着在纸页上的，更加具体的中国。

我的阅读是从张承志《早海里的鱼》开始的。在这篇散文里，张承志提供了当代中国的经典图像——“早海里的鱼”。我惊讶于这五个字的庞大隐喻。它至少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包含了空间对人的挤压、囚禁、消耗以及人们以时间为单位进行的抗衡——将全部的意志与耐力，投入到活下去的努力中。“敞开的正房门框，盛着一方银装素裹的山岭，如一幅引人凝视的画图。”这句中国式的描述，令人同时感觉到偏远乡村的冷酷绝望和激情唯美。对于“早海里的鱼”而言，生存，是它（他）们全部哲学的核心，也关乎它（他）们的全部尊严。所以他写：“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又写：“我一直想问，在新疆，为什么不试试我托付的人？不知道地址么？还是怎么？”

“我没找，”他低头瞟着碗，“咱们和要饭的一样，谁看着也不喜欢。”

我拨弄着热腾腾的碗，一时间哑然无语。总之都过去了，没有必要渲染。想着吃了一大口。滚热的粉汤，烫过了我的胸口。

2006年的中国散文，在摆脱了所有花里胡哨的假动作之后，变得日益成熟和稳健。中国散文已经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观看、思考和表达我们的生存处境与态度。只有在散文中，才能出现这样的句子：“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

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韩少功：《回到从前》）韩少功的身手一如既往地敏捷犀利，直指现实的不堪。只是少了几分激愤，多了沉稳的思量与应对。

在2006年的中国散文中，我们目睹了杜丽的跌跤、格致的晕眩、于坚那个持续了几十年的马拉松会议，以及盛慧在夏季漫长的南方街巷中等待那个并不存在的戈多。意料之外与意料之内的生活，不该发生和应该发生的动作，在散文的声援下一一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使我们与世界保持着真实意义上的，而不是虚假的联系。它具有超出所有娱乐性文学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品种的散文，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散文为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保持了机敏的本性，使它在面对世界时能够做出准确的应对。它从不纵容我们，使我们变得日益慵懒、迟钝和沉沦。散文不具有实用性，同时，它又是实用的，这一点对于空洞的现实与我们空洞的自身至关重要。散文是一门精密复杂的实用科学，它使我们在身经百战千疮百孔之后，仍然顽强地寻视着解救自己的路径，并承受着所有的碎裂与寂灭。

2006年的散文已经深深地楔入中国的民间生活中。像一架显微镜，向我们展示了诸多平常视而不见的事物。在摆脱大词的蛊惑之后，散文已经成为一架精密仪器，在经过语言探索和高度风格化之后，无论是散文文种，还是散文家的个人气质，已经能够被明确识别。更重要的是，中国散文几乎是在整个世界的忽视中，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外部的冷落对这一进展过程毫无影响，这体现了它的自信、理性与耐心，我相信人们从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靠近，乃至深入散文内部的时候，他一定会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散文为我们的目光画出了路线。以熊育群为例：“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怒江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熊育群的方式。

2007年1月22日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

目 录

001/序	祝 勇
-------	-----

时 间

001/从天朝到中国(外一篇)	萧春雷
015/草药时代	谢宗玉

地 点

028/旱海里的鱼	张承志
049/怒江的方式	熊育群
072/布达拉宫后面	格 致
096/望蜀记	程宝林
109/青岛	玄 武
116/乡与镇	黑 陶

人 物

140/人生几度秋凉	王充闾
156/革命与雏菊	北 岛
163/美丽的选择	邵 丹
183/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狄 马
191/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张宏杰

事 件

228/扑进画框(外一篇)	韩少功
---------------	-----

234/细小的纪念	敬文东
242/桃花烧	周晓枫
252/收藏时光	盛 慧

视 听

263/重读苏蕙《璇玑图》	翟永明
271/续上海流水	孙甘露
284/流血的童话	张锐锋
297/一只倒悬在六十年代的鸭子	蒋 蓝
305/埃林·彼林在中国街头	凸 凹

感 想

313/高处	彭 程
321/情何以堪	闫文盛

总 结

338/开会记	于 坚
360/关于跌跤的 18 点思考	杜 丽

从天朝到中国（外一篇）

萧春雷

自我中心的错觉，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避免。社会和文化是自己的好，其他民族，都是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西方人称之为土著，希腊人称蛮族，中国人称夷狄。犯自我中心毛病最严重的一个例子，按汤因比的意见，要数中国乾隆皇帝在 1793 年让英国使节转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英国人明明是来谈判商业贸易的，中国人自作多情，描述为向慕中华文明，远来朝贡。这位历史学家说，这封信交出以后的一百年里，大清帝国的骄傲就受到一连串重挫。骄傲的结果向来如此。

《利玛窦中国札记》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他们由于如此无知而骄傲得不可一世，待到真相大白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屈辱。”身为外国人，利玛窦在中国各地生活了近三十年，这是他的亲身体会。我们读

了很尴尬。

中国这个名称，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含有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的观念里，中国位于世界中央，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是天朝上国。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天子，是万邦之主。国家通常指朝鲜、越南、琉球那样的朝贡国，受天朝册封、领导，属于次一级的概念。西周，天子居住的一千平方里称为中国；环绕在外面的一圈诸侯国，受中国的教化，叫五服、九服；最外圈，受中国影响微弱的，就是野蛮人，夷狄。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一个三重同心圆，华夏文明犹如太阳，向外辐射光芒。几千年间，中国的周边从来没有出现一种更优越的文明对之挑战，中国人以为这种世界观乃是天理。

夷夏之辨就是这种世界观的产物。周人自称夏人的继承者，夷夏之辨，意思就是中国和外国区别，等值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之间，适用的原则是文明应该教化野蛮，没有野蛮教化文明的道理。历史上，中国国势强大的时候，例如汉唐，没人在意夷夏的界限；每当国力衰弱，夷狄成为威胁，才祭出这法宝。内忧外患的两宋，就是大讲夷夏之辨的时代。苏东坡是把夷狄看成禽兽的，他写了篇《王者不治夷狄论》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他的意思是，野蛮人就像禽兽，无法适用我们的文化制度，用了，反而大乱。

这样，到了宋朝，夷夏之辨发展成为禽人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不仅是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区别，更是禽兽与人类的区别。晚清的琦善称英国人“犬羊之性”，张穆断言：“英吉利，一海外禽兽国也。”王闿运说“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我们要注意，他们在表述逻辑上一个标准的肯定判断，而非比喻。如果外国人真是禽兽妖怪，没有人性与伦理，必然无恶不作，于是各种谣言——比如佛郎机人好食小儿，传教士取童脑制药——传得飞快，深入人心。

反过来说，如果外国人是禽兽妖怪，就不必与他们讲理，禽兽是不配享受仁义之道的。我们不妨用上对付禽兽妖怪的办法：阴谋诡计，背信弃义，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尔虞我诈……

晚清来华的西方人，虽然文明程度更高，还是被中国人视为夷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那些前来中国的外国人，不管抱着什么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看成是野蛮人，正如古希腊人对待外族人一样。”这可是一群打败中华帝国的外国人，那又怎么样？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官员把英国人递交的外交公文都改成“禀”告中方，他们的所有要求被形容为乞求皇帝施恩，而中方的文件则“谕”英夷，带着命令的语气。英国海军上校义律对此大为恼火，几次向中方钦差大臣琦善提出抗议。在中国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除了赔款、割地和开放通商口岸，还有一项重要条款：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来往，用平等款式，中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战胜者居然向战败方索求平等待遇，也是稀罕事。

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中，是铺天盖地的英夷、法夷、夷人、夷技等字眼。在炮舰威胁下，大清朝廷在公文上做了某些让步，把夷务改称洋务或外国事件，立刻引起了抗议。在广东的侍郎罗惇衍等人上奏折说：“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牒，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应于关防内明刊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一个民族的自信力，竟寄托在酣畅淋漓地辱骂对手之上，让我们感叹不已。

战败条约也没能阻止老百姓称外国人为鬼子。鬼子是夷狄的口语化，大俗之词。易笏山曾以之入诗，写出“忽见江心起黑烟，西洋鬼子火轮船”的句子，传为奇谈。吴仰卧《小匏庵诗话》记载他同乡诗人一首《登西洋鬼子楼》长诗，有些句子如“白鬼婆娑黑鬼跃，猿啼雀步来零丁。睛圆鼻突蜷毛发，短衣密

扣灿繁星”，描绘西人形象十分生动，显然怀了恶意。1873年，《申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考证说鬼子最早是广东人叫出来的，他们还发明了洋鬼、番鬼、彝鬼、白鬼、黑鬼、红毛鬼等叫法，传遍全国。该文反对再称外国人为鬼子，理由是现在的西人大多听得懂一些中文，人家称我们华人，我们仍呼他们鬼子，有违宾主相称之道，应该停止。这篇文章写得太早。作者不会想到，日后还要出现唱遍大江南北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曲和举国高呼的“美国佬滚出去”的口号呢。

然而，我们更要注意到，在衰朽的中华帝国内部，毕竟还有另一股潮流在缓慢涌动。个别观念比较开明的中国人，开始改变称呼，给予外国人平等待遇。这意味着另一种现代的世界观在中国登场。徐继畲1844年撰写《瀛环志略》的稿本中，还满目“夷”字，1848年刊印该书时，已经改换字眼，基本不用该字。梁廷枏编撰《海国四说》时，称西人而不用番鬼、夷人等字眼，相当斯文。《海国图志》出版得太早，在用夷字，后来刊布《道光洋艘征抚记》时，魏源就将书中所有的夷字都换成了洋字。渐渐地，夷字的意义也越来越中性。光绪年间编辑《筹办夷务始末》时，夷的意思已经不含多大贬义了，夷务和洋务几乎可以等同。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很重视探悉夷情，组织人手，1840年编译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国情的《四洲志》。1841年7月，林则徐在镇江见到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把编《四洲志》的资料悉数移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出更完备的《海国图志》。我们今天觉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林则徐重视夷情十分正常，当时则未必。按照魏源的记载，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琦善就不以为然，有探悉洋人情报前来汇报者，他概不接见，还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这大约是当时士大夫的风气。睁眼看夷人夷情，就是一件越轨之举。

在台湾亲自主持抗击英军的姚莹，大力购求域外书籍，究其情事，著成介绍国外知识的《康輶纪行》出版。他也受到“弛心域外”和“矜奇眩异，骇人耳目”的批评。他回答批评者说，他的目的是使国人“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姚莹是那个时代最有识见的中国人之一。他沉痛地说：中国无人留心海外，才有今日败局，不知夷情是中国的国耻。他殷殷嘱托后继者，勿望雪耻：“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

魏源于1842年年底编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该书的出版，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大事，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林则徐的预期。魏源在《叙言》中明确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夷是什么？中国人都明白，夷是野蛮人，是禽兽。可是现在魏源说，我们要以夷为师。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呼。不错，他很保留，只说我们要学习夷人的“技”，也就是造船造枪的科学技术。他没有说我们要引进西学，学习夷人的文化。可是承认夷狄有值得中华学习的地方，这就是一次伟大的谦逊。傲慢的天朝上国，还没有完全昏聩，终于有一个思想家明白了历史的真相，低下头来，同意有限度的“用夷变夏”。谦逊是比骄傲更了不起的美德，因为谦逊需要勇气。魏源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则是号召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

还有一个郭嵩焘，我认为他是发现外国人也是人的先驱。本来，明末的李之藻早就说过：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可是他的话没人相信，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在多疑的清人眼里，等于汉奸。郭嵩焘比魏源小二十四岁，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和外国人交道打得多了，他得出结论说：“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理通之。”洋人和我们一样，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不能用欺诈、蛮横、威胁的办法去对待。当所有人都将夷人比为禽兽，认为不可理喻时，郭嵩焘的发现可谓

振聋发聩，举国骂他汉奸。我们说，真理总要被发现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郭嵩焘第二次发现真理，得到的报答还是一顶汉奸帽子，未免太让人意外。

西人既可为师，自然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在《海国图志》百卷增订本中，魏源就明确反对将文明国家称为夷狄。1879年，郭嵩焘从英国做了两年外交官回来，发表的观点更加惊世骇俗：中国不但科学技术，连政教风俗都不如欧洲各国，它们看中国，就仿佛三代盛时看夷狄一样。又说：中国的礼教早已衰微，秦汉以后，任何民族一旦与中国为缘，就委靡不振，失去精神；他倒担心华夏之风传入西洋，会害了西洋呢。王韬写《华夷辨》：华夷的区别，不在于地理位置，而在于礼之有无，不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易鼎说：风俗不善，无礼无义，乃曰夷狄，所以中国也可能降而为夷狄，夷狄也可能进而为中国。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还有个徐勤，著《春秋中国夷狄辨》，从原典入手，正本清源，破除外族人为夷狄的观念。

如此一番辩论之后，以夷变夏有了合法性，中国尽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外国学习。

晚清夷夏之辨导致一个结果，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由天下降为国家；由天朝降为中国。

我们已经指出，天下与国家，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完全不同的。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区别过亡天下和亡国两个概念。他说：亡天下是野蛮战胜文明，斯文扫地，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亡国是改朝换代，江山易姓，那是领薪水的臣子们的事。我们举个例子。明朝灭亡，没有多少老百姓去救国，只有些大臣在苦苦支撑；可是清朝统治者要民众剃发留辫，就是亡天下了，普通百姓纷纷反抗，保卫汉民族的文化衣冠。在这里，中国人原来说的国，只是朝代，和现在的意义大不相同。

所以杨度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时代变了，站在世界地图面前，人们只能从世界一角找到中国，沿袭三千多年的世界观刹那间破产。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不在世界的中央，仅仅是地球上百来个国家中的一员。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副使刘锡鸿整他的黑材料，指控三大罪，其中第二罪是“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郭嵩焘抵挡不住，只好自行引退，差一点被查办。我们常常指责西方列强对待中国不公平，其实，我们又何尝把公平给过其他国家？谭嗣同在南学会上发表演说，检讨道：“我国不惟好以中国骄人，且又好以夷狄诋人。”这样一个认识，是付出许多代价得来的。中国开始学习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外交官要明白，尊重一个小国并不是耻辱。

许多人慌张起来，中国还没有一个国名呢。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说：“吾人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妄自尊大，貽讥旁观。”他列了半天，找不到合适的名字，说还是用中国吧。黄遵宪也为没有国名操心：“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为了避免闹笑话，他的意见是用华夏做国名。

时代真的变了。19世纪末，中国中心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在先进知识分子那里，自称中国，都有点心虚。

西学给中国的最大冲击，就是降低中国的独尊地位，所以我们的民族本能地反对一切平等的文化交流。整部近代史，可以看成中国人丧失世界中心位置的历程。天下已亡，幸好国家犹在。我们不得不和曾经被我们极度藐视的夷狄平等相处，共存共荣。我们现在承认夷狄也有人性，懂道理，要互相尊重；夷狄的文明也可

能比中华优越；我们承认要师夷长技，要开放和学习。这些观念不是三千年华夏文明固有的——事实上恰恰与之相冲突——而是一百多年前才创立的。我们至今仍在受惠于这些引导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崭新观念。然而要警惕，新传统的历史太短了，还没有沉淀到民族精神的深处，我们常常遗忘它们，于是带来灾难。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中国中心观永远是最强烈的诱惑。要抵制这种诱惑。

地圆说及其发明权

中西方的文化接触，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如何接受大地是球形的学说。158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建仙花寺，住了下来，会所的墙上挂着从欧洲带来的1570年出版的奥代理的世界地图。这时候，欧洲的航海家已经结束了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能够描绘出一幅有赤道、回归线、南北极和五大洲的世界图景。利玛窦说：“在我们寓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山海輿地全图，上面有外文标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当被告知是世界全图的时候非常惊讶！”

他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不高兴，原因是它同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不同。中国人的地图是怎样的呢？利玛窦略带嘲讽地说：“他们也有类似本图的地图，他们却认为那图能代表全世界，而他们所谓的天下仅限于本国的十五个省。他们在地图上沿海绘了一些岛屿并给这些岛屿取了他们听说过的王国的名称。所有这些岛屿并在一起还不及中国最小的一个省那么大。……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无法理解大地是个球体。”

肇庆知府王泮也看到了这幅世界地图。利玛窦拿出地球仪，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一直往前走，就会回到原点；他的祖国就在